

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大学期间的阅读。哲理、激情，飞流直下、万马奔腾。彼时的张胜友，已经名满天下。

最早受到他的恩惠，是1998年。

那一年，我30岁，还是一个懵懂青年，却仰望文坛高墙，决心以国内最火的邯钢经验为背景，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处女作。但当我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并开始采访时，猛然听说他正在创作这个题材。而当时的他，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且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我胆怯了，决定退出，却又被告知合同神圣，不能毁约。在这本书的整个采写过程中，我时时想到他，想到面前有一座大山。

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我竭尽全力，写出了处女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而幸得薄名。

我走进文坛时，他已走上中国作协领导岗位，并负责报告文学方面的工作。

作为一名新人，我渴望认识他，便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总机转分机。

“您是张书记吗？”我战战兢兢，忐忑忐忑。

“哦。”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简单地自我介绍，并表示了希望拜见的意思。

“我太忙，没有时间。”他直接回绝。

话音刚落，“啪嗒”一声，电话挂

恩师胜友

□李春雷

断了。

听着话筒里“嘟……嘟……”的忙音，我的眼前一片空白，愈发地感到自己的卑微。

那几年，我就是在这样的孤独和自卑中，拼命地创作。幸运的是，也频频得奖。我注意到，这些奖项的评委会主任，大多是他。

2004年夏天，我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得奖者共三人，我排列第一。我惶惶诚恐，却又惊奇地发现，评委会主任竟然又是他。

颁奖晚会之前，众多评委和获奖

作家围坐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接近他，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

他抬起眼，慢慢地看着我，用浓重的福建普通话：“哦，哦，我晓得你，这个，这个，你看到了吧，我们并不认识，你却是状元，这最少说明评选公正吧。”说完，他又扭转头，与别人说话。

我尴尬地站立片刻，讪讪地退回原位。

此后几年，我仍然没有走近他，只是经常听他在台上高谈阔论，国内

国际、经济改革、报告文学，高屋建瓴，简明精准。的确，他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记忆惊人。

他，实在是奇人奇相，大耳朵，厚嘴唇，一副蛮夷面貌，满口闽语方言，虽是满腹经纶的鸿儒，却又极像一位农民企业家。

2009年4月，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中国作协派出一个三人小组，赶往灾区采访。他是组长，军地各一人，我有幸入选。那些天，我们住在春熙路一家宾馆，朝夕相处。而我，终于有机会与他深层交流。

一次早餐后，他仍坐在那里咖啡，用一根细长的玻璃棍缓缓地搅拌。

忽然，他抬起头盯着我说：“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如果你过去和我们一样，是一线作家的话，那么，《木棉花开》发表后，你就超越我们这些人了。”

什么？什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我怔怔地看着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仍是慢条斯理地搅拌着咖啡，犹如高僧品茗，一半是威严，一半是慈祥。

这句话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稚嫩的我，浅薄的我，哪里担得起呢？要具备多么豁达胸襟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退休后，我们每年总要见面几次。他总是感叹当下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不足，总是勉励我，也总是发来自己的作品，谦逊地让我提意见。他的作品，愈发地情理交融、大气磅礴，庾信文章老更成，特别是政论体报告文学。

后来，他生病了，而且是白血病。

忽然有一天，传说他病危，大限不远。我马上打去电话，无人接听。又听说他已经赴台湾治疗，有所好转。果然，不久之后的一次聚

会上，他又出席了，还是那么谈笑风生，言辞铿锵，只是虚胖一些。他毫不避讳地说起自己的病情，鬼门关太拥挤，资历不够，被阎王遣返原籍，又说自己的生命密码已经重组。大家纷纷鼓掌，庆幸他的新生。我也发去一条短信：大难已过，必有寿福！

几个月前，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我虽然申报，却因曾经获奖，便无奢望。结果出来，榜上有名。最让我意外的是，本届报告文学的评委会主任，居然又是他——退休多年且身患绝症的他！

颁奖之后的一天，我打去电话，表示要当面致谢。他婉言拒绝，说明天早晨去协和医院输液，午餐时才能回来。我便坚决地恳请，您有病，更需探望啊。

他犹豫一下，终于发来了家庭住址。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我结结实实地买了两大捧鲜花，赶往病房。虽然已是秋风萧索，我要送他百花盛开，满室芳香。

但是，找到家门，再三按铃，却无人应答。我不敢打电话，静静地伫立。一个半小时，仍不见人，只好把鲜花摆放门口，怅然而归。

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收到他的微信。原来是医生留置，深度复查。

我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却又马上否定自己。以他的年龄和性情，加上优异的医疗条件，肯定能够渡过险关。

最近一个月，我多在南方采访，不忍联系，却一直在心底为他祈祷。

殊不知，2018年11月6日晨，突遭噩耗。

整个早晨和上午，我怆然无语，茶饭不思。看着天上一片片鱼鳞状的黑色云团，默默西去，不觉四肢如铅，泪流满面。我按照老家吊唁长辈的规矩，向北而跪，长哭以祭。

红尘弥漫，人生苦短，什么是情，什么是缘。

道德文章，世所罕见，星辰永恒，斯人云远。

呜呼哀哉，恩师安眠！

10月29日凌晨，李希凡老师溘然长逝。他的突然离世，让人措手不及。因为前一个星期，我们还在筹划着下一周与李老的见面，想放松聚聊一次，也向李老汇报计划中的《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的进展工作。我们印象中的李老，精神矍铄，虽是90多岁高龄，依然脑力健旺、思维清晰，时时刻刻系念着红学事业，《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是他一直关心的事。

他逝世的不幸消息让我难以抑制悲伤，时而眼眶湿润，不免落泪。以往接触、交往、座谈、聆听教诲的情景历历在目，恍然如昨，令人挥之不去。他总是将他最新的著作签上名赐我一份，他总是以谈学为主兼及生活安排，他总是问学界最近有什么新发展，他总是问我

们还应该做什么科研项目，以推动学术事业的提升等等。

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获得他的鞭策与鼓励了。

2013年上半年，我曾经到家采访

过李希凡老师。

问的话题事关1954年

他红学批评的起步之作，话题有些老，

但他依然耐心地回忆并讲述了当时客

观的历史契机和真实的批评意图。

这些话题虽然老早就是历史的聚焦之点，

但是却不断有新内容。比如有些怀疑者总是以窃斧之疑看待这次重大历史事件，认为暗地里必然有未曾揭秘的幕后交易，不能当作是一场文学批评来看。他们认为李希凡没有将全部历史事实描述出来，其中隐藏着关键环节。

初出茅庐的学生，由于向名人发

起了不妥的学术批评，而受到毛泽

东支持，因此一夜成名天下知。有的

人不相信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

生能写出引起重大历史思想冲突的文

章，刻意求深地认为还有其他玄机。

其实，了解李希凡当时的知识结构

和人生追求的话，就不难看出历史偶然中的必然。他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学习，做了大

量的笔记，一直尝试着将其作为方法

论来展开思想辩论，加上自小对古典

名著的喜爱，以及在山东大学读书时

对文艺理论课的痴迷，使得他成为脱

颖而出的时代宠儿。那个天翻地覆、

改天换地的时代，有许多话题要变，

有许多思想要变，有许多思潮要变，

有许多文化、学术人物要变，甚至包

括文体文风，包括提问方式、写作习

惯等。创新中有继承，而这次创新更

多地表现为对旧有学术范式、话语主

题、文风的反叛。历史的当事人，后

来都意识到了这场以思想批判为名

的思想变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

在后来的历史聚会中，俞平伯和李希

凡的见面，心中毫无芥蒂和障碍，不是

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问题，而是从来就

没有个人恩仇。他们都没有将此看作

是意气之争、宗派之争，分歧就是已经

表明的立场与态度，没有皮里春秋的

虚虚实实，因此也不需要转化成为个

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谈到这段历史，

李老显得坦然自信，他说我没有什

么需要隐瞒的，也不需要虚构什么，至

于有些人说我虚构了向《文艺报》问

询可否发表批评俞平伯文章的细节，实

在是不懂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十分活

跃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说到这儿，李老

再次对山东大学的《文史哲》表示深深

的敬意，对当时的主编和编委表示感谢。

他们不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而且还是第一次将在校学生的学习报

告发表出来，也是创了该杂志的一个新

纪录。李老回忆说：我的第一篇文章

《典型人物的创造》，本是一篇学习笔

记，是文艺学吕荧老师的作业，是被吕

荧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了，

这也是《文史哲》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

章，自然是一件新鲜事。说起来，后来

引起毛泽东同志关注的那篇《关于红楼

梦简论及其他》并不是李希凡充满锐气

的第一篇文章。

我曾经为1954年那次红学论争写

过文章，不是为李老辩诬，因为李老不

需要辩诬，那段历史也不需要辩诬。他

一直光明磊落，一直是作为一个文学批

评者，是以一个普通文艺批评者的身

份来进行着心目中崇高的文学事业，没

有政治投机的任何算计、任何得失计较。

李希凡老师一以贯之地坚持着自己的

批评方法，对于20世纪历次参加的批

评活动，依然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

和个性的锋芒，在对以往重大历史事件

的回忆中也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他认为

回顾20世纪我国文学批评的历史风

云，不要过多地去揣测背后的所谓“个

人恩怨”和不可告人的“历史秘密”，特

别是对人物做评价时，有些人刻意去拨弄是非，夸大宗派情绪，从细节上去捕风捉影，没有大历史的观念，导致了严重的歷史失实和扭曲。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观点之间理论立场的差异与对立，以及对历史、现实的不同态度等。

2015年我的《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将要出版，我找李老为我写序，李老欣然应允。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他不是一位随便给人顺水人情的人，而是郑重其事地谈起我的写作，李老说我的论文是“评多论少”，撰文、论争、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立论，最终应该形成自己的全新系统见解和理论观点。1954年李老已经蜚声文坛，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人生榜样，现在叫偶像，而11年后1965年才出生的我，居然能够得到李希凡老师的墨宝，心中自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激动。除此之外，当时已经80多岁的李老在认真地阅读过我这位小他38岁的学生的幼稚论文之后，提出这样中肯、恳切的批评和高标准的要求，令我感动，又感觉冒昧和汗颜。

探索李老的精神世界，不理解毛泽东在李希凡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法理解李希凡的。他受到了历史伟人的影响，人格感召，借助于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细致研读，深悟民族的复兴诉求与人民的愿望和追求，自觉将个人的奋斗与伟大的历史进程相融合，这使得毛泽东和这个“小人物”发生了许多间接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几次关于文学以及涉及李希凡的谈话，既是鼓励也是教育，几个回合之后，也是深深地反思之后，他默然领受了领袖对他的要求，立志终生做一个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立场的文艺战士，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展开以求真求美为目的的无私无畏的批评。李老回顾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尽管风云变幻，有时也有唐突和冒失，但人生无悔，并对自己敢于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走向成熟而自豪。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这句话是：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进步。说起当前的红学研究，李老认为，近几十年无论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入探讨，作家身世和版本研究的发掘和考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同样有回潮和灾害，如某些强势媒体和背后商业利益所驱使的“揭秘”文化流行，使红学这一显学成为大俗学。近些年来，各种不负责任的观点，各种没有根据胡编乱造的观点，借助于炒作需要，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的文化热点，这实际上是红学发展中的透支。针对这些乱象，有几位红学家进行了负责任的批评，但却被说成是“围殴”、“群殴”某人。这是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这种透支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对民族优秀精神文化遗产的。

李老生前，红学界的老朋友每到年底或第二年初都会聚会一次，话题是《红楼梦》，气氛总是欢快和愉悦的。聚餐结束，李老总是让自己家人抢着付账，他说，和大家聚聚我很高兴，再说我的退休工资比你们都高呀！李老在我眼中是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既是毛泽东所说的“小人物”，又是心底无私、襟怀宽广的大人物，但他把自己当成是我们红学会中普通一员。201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换届选举，李老坚辞辞会名誉会长，是因为当时会场全体代表的掌声挽留，他才无奈地领命荣受。当然，在和李老交往中，绝不是只有轻松的聚会，还有嘱托。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印象中，经常在周五，或者两周一次，甚至一周一次，李老总是给我打电话询问红楼梦研究所的科研进展情况。我不能忘记，李老总是说，红楼梦